

10 台灣民眾的「戰爭認識」 初探

汪宏倫

引言

2021年5月，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以台灣雷達圖為封面，台灣的左上方是中共五星旗、右下方是美國星條旗，雷達圖上錯落分布着軍機或軍艦的光點，黑底反白的醒目標題則是〈地表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The Economist*, 2021）。

身處「地表最危險的地方」：台灣民眾如何看待戰爭？

在這則封面故事中，《經濟學人》指出，過去數十年來，美國與中國之間在台灣議題上維持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使得台

* 本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MOST 107-2410-H-001-083-MY3）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助理林政協助蒐集文獻與分析資料。

海得以維持和平迄今。然而，這種維持了數十年的策略性模糊，已經開始逐漸產生轉變。隨着中國整體國力增強，美國開始擔心無法阻止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企圖。2021年3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在國會的聽證會中表示，中共最快可能會在2027年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由於台灣是美中兩強的競技場，美中兩大強權一旦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對全世界來說將會是個災難，因此台灣被視為是「地表最危險的地方」。

不令人意外的是，《經濟學人》的這則封面故事一出，立刻引起台灣媒體輿論的注意，無論是紙本、電子與網路媒體，不分立場，紛紛給予相當篇幅的報道與評論。對於向來渴望「被世界看見」的台灣來說，這次的封面故事讓台灣再一次被世界看到，但其意涵恐非正面。事實上，台海近年來日益升高的戰爭危機，並非只在2021年才引起外媒關注。早在2017年，美國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預測了「2018年最有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方」，其中台灣排名第二，僅次於北韓（Farley, 2017）。的確，自從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後，兩岸關係逐漸緊繃，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逐漸升高，甚至開始出現「武統」的聲音；尤其2020年蔡英文勝選連任以來，中共軍機繞台頻率增加，軍事挑釁動作不斷，使得兩岸的對峙氣氛更加緊繃，也讓周邊國家感受不少威脅。另一方面，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7年就任美國總統後，一改前朝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對外政策，提出「印太戰略」來因應北韓威脅與中國崛起，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而中國政府也不甘示弱，頻頻採取「戰狼外交」的策略強勢回擊，使得美中關係日趨緊張，有些學者更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來形容美中兩大強權所面對的情勢，警告美國與崛起的中國之間可能「註定一戰」（Allison, 2017）。這個兩強爭霸的局勢，在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後並沒有太大改

變。處在美國與中國兩大強權夾縫之間求生存台灣，也被認為是未來美中軍事衝突的可能引爆點。

然而，相較於學者專家、媒體評論家與外部觀察者，台灣社會內部對於兩岸發生戰事的可能性，又有什麼看法？身處「地表最危險的地方」的台灣民眾，是否也和學者專家與媒體觀察者的看法一樣，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戰爭風險、危如累卵的地方？本文從社會學的角度，結合實徵資料，嘗試對台灣民眾的「戰爭認識」（perceptions of war）提出初步的理論探索與經驗上的考察。

理論概念、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本文提出「戰爭認識」的概念，用來泛指各種行動者（例如政策決定者、學者專家、媒體輿論與一般民眾）對戰爭的認知與感受。戰爭認識雖然談不上是一個已然確立的學術概念，但在過去的學術研究與一般的媒體報道中，其實已經廣泛使用這個詞彙，並就相關議題累積了一定程度的討論。在學術文獻中，有些直接使用了「戰爭認識」這個概念（如 Cole, 1973, Kim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5）；有些雖然並未使用相同的措辭、而是採用其他概念（例如「安全威脅認知」[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 或「軍事威脅認知」[military threat perception]），但內涵其實是與「戰爭認識」重疊或相近的（Oren and Brummer, 2020）。無論使用的是什麼詞彙，對於戰爭或軍事威脅的認知及感受，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課題。

過去有關戰爭認識的文獻，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國際關係、和平研究或衝突研究的領域裏，有時被當成自變項（例如：戰爭認識如何影響到參與戰爭與否的決策），有時則被當成依變項來解釋（例如：哪些因素會影響到人們對戰爭的認識）。而在分析層次方面，有些研究專注於政治精英或決策者的戰爭認識，有些則探討一般社會大眾或特定群體（例如學生）對戰爭

的認識。由於關注對象與分析層次的不同，資料的取得方式與分析方法也有相當大的不同。有些研究以領導人物的談話、言行作為分析焦點，有些則集中在媒體報道與輿論的內容分析，而更常見的是以民意調查的方式，透過預先設計好的問卷題目來理解一般社會大眾或特定群體對戰爭的看法。舉例來說，Myers 及 Hayes (2010) 根據民意調查的資料，分析美國民眾對軍隊傷亡人數的（錯誤）認知 ([mis]perception) 如何影響他們對美軍從伊拉克撤軍的看法。Kim (2014) 也是根據民意調查資料，探討大眾的情感 (affect) 與知識 (knowledge) 如何影響社會是否支持美軍參與涉外軍事行動的態度。Mueller (1979) 從冷戰時期敵對陣營（西歐與蘇聯）的行為模式，計算出 G-M 分數 (Gamson-Modigliani score) 來解釋美國不同教育群體（大學生、高中生與小學生）的戰爭預期 (war expectations)，從中區分出樂觀主義、悲觀主義以及鷹派與鴿派等立場。Kim 及 Bueno de Mesquita (1995) 則是從博弈理論 (game theory) 的模型，推導出戰爭認識對於戰爭風險 (risk of war) 的影響。Cole (1973)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討對自我以及對敵人的認知，如何影響到是否參與戰爭的決定。Oren 及 Brummer (2020) 則是透過國會檔案、口述歷史與媒體報道等資料，分析冷戰時期日本的防務體系官員及政治領袖對中國與蘇聯的威脅感知 (threat perception) 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上述這些文獻顯示出，對戰爭或軍事威脅的認知，無論作為自變項或是依變項，都是理解外交、軍事與國內外政治的重要因素，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乃建立在上述文獻的基礎上，希望帶入社會學的觀點，就戰爭認識這個議題，在理論上與經驗上提供進一步的思考與檢證。

從時間的面向來看，戰爭認識可以分成「對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戰爭的認識」與「對現在或未來的戰爭認識」，前者很可能會影響後者。根據汪宏倫 (2014) 所提出的「戰爭之框」

(frames of war) 理論，戰爭可以被當成一種轉化結構的事件 (structure-transforming event) 來加以分析，而戰爭可能改變的結構除了常見的領土、統治者 (政權)、被統治者 (人民組成)、物質與經濟資源之外，另外一個不易被看見、但卻影響深遠的結構，在於人們的認知框架。換言之，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戰爭，可能透過「戰爭之框」的作用，持續形塑、影響着人們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認知。關於過去戰爭的理解與詮釋，我們可以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認識問題」脈絡中來理解；¹ 為了避免混淆，本文所稱的「戰爭認識」，專指人們對現在進行中、或是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的認知而言。

「戰爭認識」可說是一個概括性的詞彙，用來泛指人們對戰爭的認知與感受；如果進一步分析其具體內容，我們可以將戰爭認識區分成以下幾個面向來加以理解：

一、敵友區辨：戰爭的首要之務是區辨敵我。一場戰事必然至少牽涉到交戰的雙方，因此區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便成了首要的問題，而這也是戰爭的認識框架（「戰爭之框」）所作出的最根本分類（汪宏倫，2014）。敵友的區辨愈清楚，代表「敵情意識」愈高。如果把某一方視為敵人的傾向增強，未來彼此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比較高；反之，如果把對方當成朋友，彼此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便會降低（Smith, 2005）。

二、戰爭預期：戰爭預期，指的是對（自己所處的國家）

1. 所謂「歷史認識問題」，或稱「歷史問題」，專指二次大戰後，東亞各國之間（主要環繞着日本、韓國與中國）對過去歷史（尤其涉及戰爭與殖民經驗）的不同詮釋所引發的種種爭議與論辯。類似的問題，其實也見於戰後的西德，體現在 1980 年代的「歷史學大辯論」（Knowlton and Cates, 1993）。

未來發生戰爭可能性的預期。² 戰爭的可能性，又可分為主動（發動或參與戰爭）與被動（遭到軍事攻擊或因其他因素捲入戰爭）。由於戰爭通常是由掌握政治或軍事權力的人所發動，一般社會大眾無法直接參與是否發動或參與戰爭的決定（雖然可以透過媒體或民意壓力來影響政府參戰或不參戰的決定），兩者之間存在着極大的資訊不對稱，因此政治／軍事菁英的戰爭預期與一般民眾的戰爭預期，必須有所區分。本研究的探討焦點，將以一般社會大眾的戰爭預期為主。

三、軍事信心：戰爭一旦發生，結局必然有勝有負，或是以和局收場；而影響勝負的關鍵因素之一，便是軍事實力。軍事信心，指的是對於自己國家的軍事實力的信心程度。軍事信心的高低，有可能影響到人們對戰爭的預期與想像。

四、參戰意志或保衛決心：參戰有主動（發起戰爭攻擊他人）、也有被動（抵禦他人所發動的攻擊）。主動參戰需要有參戰的意志，被動參戰需要有防衛的決心。戰爭的決策權雖然不在一般民眾，也不是所有的民眾都有機會上前線參與戰爭，但是在「總體戰」的趨勢形成之後，³ 所有的國民（或共同體成員）都有機會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戰爭（例如無形的精神

-
2. 此處必須強調是「自己的國家」，乃是因為廣義的戰爭預期其實可以包含外部觀察者對某一對象個案是否會發生戰爭的預期（例如英國《經濟學人》記者對台海發生戰爭的預期），但這並不包含在本文討論的「戰爭認識」的範圍內。
 3. 「總體戰」（total war）是一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才興起的新詞彙，最初見於德國將領 Erich Ludendorff（1935）的著作，在此用來泛指民族國家動員一切人力、資源與精神所進行的現代戰爭。不過，「total war」也可能指「全面戰爭」，除了強調全面動員之外，也包含了全面交戰、全面毀滅等意涵，學界對此存在不同的界定與指涉。參見 Chickering（1999）。

支援，或是有形的資源投入）。因此，是否具有堅定的參戰意志或保衛自己家園的決心，也是理解戰爭認識的一個重要因素。

五、軍事動員與國防準備：戰爭必然牽涉到人力與資源的投入。因此，要動員多少人力、投入多少資源在國防與軍事開銷上，也是戰爭認識的重要一環。

除了上述五個面向外，戰爭認識還有其他面向值得討論，例如是否贊成以戰爭手段解決問題、是否支持某一場正在進行之中的戰爭，或是對戰爭的評價等等。⁴ 由於篇幅與資料的限制，本文將只集中探討戰爭認識中的上述五個面向。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對台灣民眾的戰爭認識提出初步的描繪，並探討影響戰爭認識的主要政治與社會因素。換言之，除了從上述五個面向描繪台灣民眾的戰爭認識的基本樣貌外，本研究也將把上述五個面向當成依變項，探討哪些自變項影響着人們對戰爭的認識。具體來說，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是：台灣民眾在敵友區辨、戰爭預期、軍事信心、保衛決心，以及國防準備這五個面向上，呈現出什麼樣的戰爭認識？什麼樣的社會背景與因素，會影響人們對戰爭的想像與看法？質言之，除了基本的社會位置與個人社經地位外，還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人們的戰爭認識？在台灣的現實脈絡中，最有可能與台灣發生戰爭的對象，是彼岸的中國大陸，而由於過去的歷史脈絡與特殊的政治情境，人們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很有可能受到不同的族群身分、國族認同、政黨傾向乃至統獨偏好的影響。這些因素，是否也會影響人們的戰爭認識？如果有，那麼又是在

4. 關於此一面向，最值得討論的顯著案例是日本。由於日本在戰後制定了所謂的「和平憲法」，其中第九條明確規範了「放棄交戰權」、「不保有武力」等事項（儘管現實中仍保有自衛隊），因此日本民眾的戰爭認識，與世界各國相較，在這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差異。

哪些面向上，以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都是本研究想要探究的幾個基本問題。

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分析的資料，主要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委託中研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透過電話訪問所進行的「中國效應調查」。本研究所採用的是 2017 至 2020 年，每年春天所做的調查資料，一共包含四個年份。另外，為了補充上述調查的不足，同時理解最新的趨勢與變化，本研究也使用了中研院社會所 2020 年下半年的「社會意向調查」所蒐集的資料。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一共有五筆，包含 2017 至 2020 年的中國效應調查資料，以及 2020 年下半年的社會意向調查資料。各項調查的年度與完成的樣本數，請參見表 1。

有關用語部分，必須稍作說明。由於發動戰爭的主體基本上是掌握軍隊的國家，或是擁有組織化暴力的政治團體，而不是社會或一般民眾，因此本文的討論中，大部分以「中共」或「中國政府」來指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儘管在相關的調查資料中，可能僅僅使用「中國大陸」這個籠統的名詞來指涉對岸或其政府。

變項與測量

根據前面的討論，本研究將依變項「戰爭認識」分成敵友區辨、戰爭預期、軍事信心、保衛決心與國防準備五個面向來加以分析，各個面向分別以不同的題目來測量。各面向的相應題目與測量指標簡述如下：

一、敵友區辨：台灣自從 1991 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於 1992 年解除金馬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後，便不再把

表 1：調查資料來源與各年度完成樣本數

	中國效應 2017	中國效應 2018	中國效應 2019	中國效應 2020	社會意向 2020 (下半年)
樣本數 (N)	1225	1228	1253	1234	1218

對岸的中國政府當成戰爭對手。然而，由於中共從未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近年來「武統」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因此，儘管兩岸民間互動頻繁，但中國大陸對於台灣來說，仍是個有可能對自己發動軍事攻擊的潛在敵人。台灣民眾究竟把中國大陸政府當成敵人還是朋友，是「戰爭認識」的根本問題之一。中國效應調查從 2017 到 2020 年，都針對敵友關係的認定，詢問受訪者以下問題：「有人說，中國大陸政府是台灣的朋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答案的提示選項分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其餘類別則為「不知道／無意見／拒答」（以下各題選項均同）。本研究將回答分為「同意」（含「非常同意」）與「不同意」（含「非常不同意」）兩組，以二元變項處理，其中 0 = 不同意，1 = 同意。回答「同意」與「非常同意」的，表示將中國大陸政府視為朋友；回答「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的，表示不把中國大陸政府視為朋友。同樣地，調查問卷中問了下面的問題：「有人說，中國大陸政府是台灣的敵人，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回答「同意」與「非常同意」的，表示將中國大陸政府視為敵人，其對應值為 1；回答「不同意」（含「非常不同意」）的，其對應值為 0。這兩題可以作為測量台灣民眾的敵友區辨的指標。

二、戰爭預期：對於台灣民眾的戰爭預期，我們可以分為「長期」與「短期」兩者來加以衡量。長期而言，中國效應調

查在 2017 至 2020 年間，曾經對受訪者問了以下問題：「如果台灣一直拒絕統一，請問您認為中國大陸會不會用武力壓迫台灣談判統一？」根據回答的選項，可以分為兩組：會（包含「一定會」、「可能會」，其對應值為 1）與不會（包含「可能不會」與「一定不會」，其對應值為 0）。雖然不是直接問到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認為中共可能終究會以武力壓迫台灣統一，可以視為是一種長期的戰爭預期。就短期的戰爭預期而言，2020 年的社會意向調查對受訪者提問了以下問題：「請問您認為未來兩年內，中國大陸可不可能以武力攻打台灣？」根據回答選項，同樣可以分成「可能」（包含「非常可能」）與「不可能」（包含「非常不可能」）兩組（0 = 不可能，1 = 可能）。這是非常具體明確地詢問民眾「兩年內台海發生戰事的可能性」，反映的是一種短期的戰爭預期。

三、軍事 / 國防信心：中國效應調查在 2020 年曾經提問：「請問您對於我們軍隊保衛台灣的能力，有沒有信心？」回應可分為「有信心」（包含「很有信心」）與「沒有信心」（包含「很沒有信心」）兩組，其對應值為 0 = 「沒有信心」，1 = 「有信心」。2020 年底的社會意向調查，則是詢問：「請問您同不同意，如果發生戰爭，目前台灣的軍隊有能力保衛台灣？」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的，可歸類為「對軍事 / 國防有信心」，其對應值為 1；回答「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的，則歸類為「沒有信心」，其對應值為 0。

四、參戰意志 / 保衛決心：在參戰意志 / 保衛決心方面，本研究採用中國效應調查 2017、2018 年的題目來測量：「大家都希望兩岸能維持和平。萬一中國大陸以武力攻打臺灣，請問您願不願意為保衛國家而戰？」2020 年，則以社會意向調查的題目來測量：「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使用武力，請問您願不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回應可分為「願意」（含「非常願意」）

與「不願意」（含「非常不願意」）兩組，其對應值為 0 = 不願意，1 = 願意。

五、軍事動員 / 國防準備：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來源，並沒有直接針對國防經費或軍事資源方面的議題對受訪者提問，因此只能從「恢復義務役徵兵制」來理解台灣民眾對於國防準備的看法。中國效應調查在 2017 至 2019 年間詢問的題目是：「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保留（至少一年的）義務役徵兵制度？」另外，由於性別意識改變，加上近年來志願役的女性從軍案例增多，2018 年的中國效應調查提問：「如果恢復義務役，請問您贊不贊成女性和男性都同樣要當兵？」2020 年社會意向調查的題目則是：「如果台灣的義務役改為：無論男生或女生都要當一年兵，請問您贊不贊成？」這兩題除了測量性別平等的意識之外，也可視為「全民皆兵」的一種國防準備測量指標。上述各題的回應，也可以分成「贊成」（含「非常贊成」）與「不贊成」（含「非常不贊成」）兩組，其對應值為 0 = 不贊成，1 = 贊成。

在自變項方面，本研究的自變項除了個人社會位置、社經地位之外，也納入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統獨偏好等。各個變項的測量指標分述如下：

一、個人社會位置：包含性別、世代、婚姻狀態與族群身分等指標。世代根據年齡，區分成年老世代（50 歲及以上）、中年世代（30-49 歲）以及年輕世代（29 歲及以下）。婚姻狀態分為已婚與未婚。族群身分，則是依受訪者的父親族群身分來認定，分成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以及外省人。原住民及外國籍因樣本數量過少，不列入分類。

二、社經地位：主要以受訪者教育程度、以及個人平均每月收入為指標。教育程度分成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大專及以上三個類別；個人每月平均收入則由 0（沒有收入）到新台幣 20 萬以上，分成 14 個等級區間，以連續變項處理。

三、政黨傾向：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分成「泛藍」、「泛綠」與「中間選民」三類，其中「泛藍」包含了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民國黨、信心希望聯盟等，「泛綠」包含了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時代力量、綠黨、社會民主黨、基進黨等，「中間選民」則包括「都不支持」、「沒有特定支持政黨」，以及2019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

四、國族認同：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分成「台灣人」、「中國人」以及「兩者都是」（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三個類別。

五、台獨偏好：在台灣民眾的統獨偏好中，「台獨」（意味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可能帶來的風險是戰爭，因此有些人不願在統獨之間做出明確選擇。在中國效應與社會意向的調查中，均詢問受訪者以下問題：「有人說：『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不會引起戰爭的話，台灣就應該宣布獨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表示在排除戰爭因素之後，偏好選擇獨立，本研究稱之為「台獨偏好」。反之，如果選擇「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表示即使排除戰爭因素，仍不支持台灣獨立，這是缺乏對台獨的偏好。

六、統一偏好：同樣地，在台灣民眾的統獨偏好中，有些人可能因為兩岸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差距過大，而不願選擇統一。在中國效應的調查中，詢問受訪者：「有人說：『如果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發展和台灣差不多，兩岸就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的，表示認為兩岸在發展狀況差不多的條件下應該統一，本研究稱之為「統一偏好」。反之，則是代表對統一缺乏偏好。2020年社會意向調查的題目為：「有人說：『如果中國大陸成為民主國家，兩岸就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雖然措辭稍有不同，而且強調的是以「成為民主國家」作為前提，但基本上仍可視為統一偏好的測量指標。

表 2：敵友區辨

	2017	2018	2019	2020
敵人關係				
同意	27.0% (331)	27.9% (342)	30.9% (387)	44.8% (553)
不同意	69.8% (855)	67.9% (834)	65.0% (815)	50.4% (622)
沒意見/不知道/其他	3.2% (39)	4.2% (52)	4.1% (51)	4.8% (59)
N	1225	1228	1253	1234
朋友關係				
同意	36.2% (443)	38.8% (476)	38.1% (478)	22.7% (280)
不同意	60.3% (739)	57.3% (704)	57.5% (721)	73.0% (901)
沒意見/不知道/其他	3.5% (43)	3.9% (48)	4.3% (54)	4.3% (53)
N	1225	1228	1253	1234

注：括號內為分配次數。

分析結果

為了便於討論，本文將依據戰爭認識的各個面向逐步分析討論。在針對每一個面向進行討論時，將先就歷年的調查結果做描述統計的分析，其次再針對相關的自變項，進行推論統計的分析。由於所有的依變項都已經簡化成二元變項，因此推論統計部分以二元對數迴歸分析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為主。

敵友區辨

從表 2 可以看到，台灣民眾將中國大陸政府視為敵人（以下簡稱「敵人關係」）的比例，自 2017 年以來便逐年上升，

2020年更是較2019年上升了13.9個百分點，達到44.8%。反之，將中國大陸政府視為朋友（以下簡稱「朋友關係」）的百分比，除了在2018年微幅上升外，之後逐年下降，尤其2020年較2019年大幅下滑了15.4個百分點，只剩下22.7%。

進一步的二元對數迴歸分析發現（參見表3、表4），在「敵人關係」的問題上，性別、世代、婚姻狀態、教育程度、政黨傾向、國族認同、統獨偏好在不同年度均出現影響，而在「朋友關係」的問題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除了世代、教育程度、族群身分、政黨傾向、國族認同、統獨偏好外，個人收入也有影響。其中一個較值得關注的因素是性別。比較影響民眾對敵友區辨的因素，各個年度並不完全相同，只有性別的影響最為一致。在「朋友關係」的問題中，性別在各個年度都不顯著，表示性別對於朋友關係沒有影響。但是，在「敵人關係」的問題上面，性別在每個年度的分析中都是顯著的負向影響，表示女性較不可能將中共視為敵人，而且這個影響持續而穩定。

除了性別之外，另一個令人玩味的因素是世代。綜合表3與表4的分析結果來看，「世代」在2018年同時對敵友區辨有顯著影響。從表4可以看出，針對「中國大陸政府是台灣的朋友」這個問題，年輕世代（29歲及以下）回答「同意」的可能性顯著高於其他世代。相對地，針對「中國大陸政府是台灣的敵人」這個問題（表3），年輕世代（29歲及以下）回答「同意」的可能性顯著低於其他世代。換言之，相較於其他世代，29歲及以下的年輕世代更有可能把中國大陸政府當成台灣的朋友，也比較不可能把對方當成敵人。這個世代效果只有在2018年同時對「朋友關係」與「敵人關係」產生顯著影響，與其他各年有所不同。這個現象應該如何解釋？一個合理的推測是，中共在2018年2月28日發布了「惠台31項措施」，內容涵蓋了金融、就業、教育、醫療、影視等多個領域，其中有12項涉及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的同等待遇，19項則是為前往中國大陸

表 3：敵友區辨（敵人關係）的二元對數迴歸分析

自變項	2017	2018	2019	2020
女性(男性)	-0.609***	-0.916***	-0.501**	-0.726***
世代(年老世代：50歲及以上)				
年輕世代：29歲及以下	-0.444	-0.973**	-0.139	-0.634*
中年世代：30-49歲	0.005	-0.326 ⁺	-0.232	-0.038
未婚(已婚)	0.456*	0.265	0.075	0.187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07	0.005	0.001	0.001
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0.430 ⁺	-0.489*	-0.648*	-0.141
高中職	-0.022	-0.536**	-0.613**	-0.168
族群身分(外省人)				
客家人	-0.180	-0.153	0.611 ⁺	0.040
閩南人	-0.104	0.331	0.436	-0.025
政黨傾向(泛綠)				
中間選民	-0.688***	-0.757***	-1.449***	-0.903***
泛藍	-0.868***	-1.413***	-1.866***	-1.365***
國族認同(台灣人)				
兩者都是	-0.568**	-0.732**	-0.428*	-0.865***
中國人	-0.350	-0.281	-1.874*	-0.711*
台獨偏好	0.859***	0.606***	0.727***	0.355*
統一偏好	-0.421**	-0.547**	-0.167	-0.383*
Nagelkerke R ²	0.184	0.252	0.300	0.220
N	1086	1088	1063	1061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號內為參照組。

變項顯著程度 Omnibus 檢定 p 皆 < 0.05。

模型適合度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p 皆 > 0.05。

表 4：敵友區辨（朋友關係）的二元對數迴歸分析

自變項	2017	2018	2019	2020
女性(男性)	0.109	0.160	0.281 ⁺	0.242
世代(年老世代：50歲及以上)				
年輕世代：29歲及以下	0.173	1.094***	0.362	0.454
中年世代：30-49歲	-0.287 ⁺	-0.055	-0.004	0.182
未婚(已婚)	0.195	-0.248	0.302	-0.183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00	-0.017*	-0.008 ⁺	0.003
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0.779***	0.714**	0.496*	0.826**
高中職	0.373*	0.422*	0.460**	0.325 ⁺
族群身分(外省人)				
客家人	-0.068	0.289	0.237	-0.306
閩南人	-0.074	-0.359	0.155	-0.488*
政黨傾向(泛綠)				
中間選民	0.305 ⁺	0.480*	0.984***	0.660**
泛藍	0.938***	1.014***	1.900***	1.314**
國族認同(台灣人)				
兩者都是	0.175	0.647***	0.808***	0.767***
中國人	0.825**	0.994***	0.970**	0.879**
台獨偏好	-0.530***	-0.295*	-0.448**	-0.227
統一偏好	0.584***	0.649***	0.460**	0.553**
Nagelkerke R ²	0.179	0.226	0.275	0.195
N	1081	1093	1058	1067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號內為參照組。

變項顯著程度 Omnibus 檢定 p 皆 < 0.05。

模型適合度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p 皆 > 0.05。

工作、居住、求學的台灣民眾逐步提供與大陸人民同等的待遇。這個大動作的宣示引發當時相當程度的關注與討論，尤其當中涉及求學、求職、創業的部分，對台灣的年輕世代來說，並非完全沒有吸引力。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因素，使得緊接着在這個政策宣布之後所做的中國效應調查中，年輕世代對中共的敵友關係的判斷，有着與歷年不同的反應。如果這個推論是合理的，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共所推出的惠台政策，並非完全沒有效果，尤其可能影響到年輕世代對中共的敵友區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敵人關係」的問題上，世代在 2020 年有顯著的負影響（參見表 3），顯示年輕世代相對於年老世代較不可能把中共當成敵人，這似乎也與一般假設「年輕世代因為接受『去中國化』的教育而形成『天然獨』、比較有可能對中國產生敵意」的常識性推斷有明顯不同。

綜合表 3 與表 4 來看，我們發現，除了性別與世代之外，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個人收入、族群身分、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統獨偏好，都在不同的年度表現出顯著的影響，而其影響方向也不特別令人感到意外。例如，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支持者），更有可能把中國大陸政府視為朋友，更不可能將之視為敵人，這個影響在歷年的模型都是顯著的。台獨偏好者較不可能把中共當成朋友（唯 2020 年不顯著），較有可能把中共當成敵人（每年皆顯著）。相對地，統一偏好者較有可能把中共當成朋友（每年皆顯著），較不可能將之視為敵人（唯 2019 年不顯著）。有趣的是，族群身分除了在 2020 年有顯著影響外（閩南人相對於外省族群較不可能將中共當成朋友），其他各年份在敵友區辨的問題上都沒有顯著影響。相較於族群身分，國族認同對敵友區辨則有顯著影響。一般來說，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更有可能將中共視為朋友而非敵人，儘管這個影響並非在每個年份的分析模型中都顯著。此外，個人社經地位對敵友區辨也有相當程

表 5：戰爭預期

	長期戰爭預期				短期戰爭預期
	2017	2018	2019	2020	2020
會 (可能)	38.4% (471)	37.3% (458)	40.1% (503)	46.3% (571)	25.6% (311)
不會 (不可能)	58.4% (715)	59.4% (729)	53.6% (671)	48.9% (603)	70.9% (864)
沒意見/不知道/其他	3.2% (39)	3.3% (41)	6.3% (79)	4.9% (60)	3.5% (43)
N	1225	1228	1253	1234	1218

注：括號內為分配次數。

度的顯著影響。個人收入在 2018 年的「朋友關係」模型中有顯著影響，顯示高收入者較不可能把中共當成朋友，而國中及以下（相對於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則明顯地較可能把中共當成朋友，較不可能把中共當成敵人（2017 及 2020 年除外）。

戰爭預期

就長期的戰爭預期來說（參見表 5），當民眾被問到：「如果台灣一直拒絕統一，請問您認為中國大陸會不會用武力壓迫台灣談判統一？」這一題時，除了 2018 年略有下降外，為逐年上升的趨勢，從 2017 年的 38.4%，上升到 2020 年的 46.3%。然而，就整體百分比來看，「不認為中共會用武力壓迫台灣談判統一」的比例，歷年來都比「認為中共會用武力壓迫台灣談判統一」的比例來得高，前者即使在 2020 年也有 48.9%，高於後者的 46.3%。換言之，儘管認為中共可能對台採取武力的比例逐漸升高，但不認為中共會對台動武的民眾仍稍佔多數。

如果就短期之內的戰爭預期來看（參見表 5），這樣的傾向更為明顯。根據 2020 年的社會意向調查，認為中共可能在未

來兩年內以武力攻打台灣的百分比，僅佔 25.6%，遠遠低於認為「不可能」的 70.9%。因此，綜合來看，認為兩岸長期可能發生戰爭的民眾，不到一半，而認為短期之內可能發生戰爭的比例更低，僅四分之一強。我們可以說，無論是從長期或短期來看，台灣民眾的戰爭預期並不高。

在二元對數迴歸分析方面，為了讓討論更聚焦，此處僅就同一年度（2020）的長期與短期戰爭預期進行比較（參見表 6）。我們發現，性別、教育程度與統獨偏好對長期的戰爭預期有顯著影響。女性（相對於男性）、高中職（相對於大專及以上）學歷者，更不認為中共會以武力逼迫台灣統一；而無論台獨偏好或統一偏好，對戰爭的預期都比較高。這說明了，對獨立或統一有所偏好的人，比起沒有偏好的人，更有可能認為中共會以武力逼迫台灣統一。而就短期的戰爭預期來看，主要的影響因素在於世代與教育程度。中年世代（相對於年老世代）、國中及以下（相對於大專及以上）學歷者，更不可能認為中共在短期（兩年）內會以武力攻打台灣。另一方面，相對於長期戰爭預期的分析結果，統獨偏好的作用消失，顯示統獨偏好對短期戰爭預期並沒有影響。

軍事信心

在軍事信心方面，目前僅有 2020 年的中國效應調查與社會意向調查有相關題目，分別在 2020 年上半年與下半年施測。有趣的是，雖然僅隔半年，兩次的調查結果卻出現顯著的差異（參見表 7）。在上半年的調查中，對軍隊保衛台灣能力有信心的民眾佔了 51.5%，多於沒有信心的 46.9%；但到了下半年，有信心的民眾只有 44.6%，低於沒有信心的 53.5%。這個逆轉，或許可以從兩岸軍事上的表現來加以理解。近年來，中共軍機與軍艦頻繁在臨近台灣的空域與水域出沒，尤其 2020 年頻率大幅提升，在這一年當中，中共軍機侵擾台灣空域便有 380 架次。另一方面，台灣在國防方面的表現卻不盡理想，甚至頻頻發生

表 6：戰爭預期的二元對數迴歸模型分析

自變項	長期戰爭預期 2020	短期戰爭預期 2020
女性(男性)	-0.371**	0.257 ⁺
世代(年老世代：50歲及以上)		
年輕世代：29歲及以下	-0.313	-0.133
中年世代：30-49歲	-0.135	-0.528**
未婚(已婚)	-0.148	-0.050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05	0.013
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0.226	-0.963***
高中職	-0.325*	-0.230
族群身分(外省人)		
客家人	-0.251	-0.435
閩南人	-0.158	-0.255
政黨傾向(泛綠)		
中間選民	-0.017	-0.008
泛藍	0.021	0.056
國族認同(台灣人)		
兩者都是	0.219	-0.010
中國人	-0.226	-0.442
台獨偏好	0.419**	0.051
統一偏好	0.363*	0.215
Nagelkerke R ²	0.046	0.042
N	1058	1076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號內為參照組。

變項顯著程度 Omnibus 檢定 p 皆 < 0.05。

模型適合度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p 皆 > 0.05。

表 7：軍事信心

	2020 上半年	2020 下半年
有	51.5% (636)	44.6% (544)
沒有	46.9% (579)	53.5% (651)
沒意見/不知道/其他	1.5% (19)	1.9% (23)
N	1234	1218

注：括號內為分配次數。

意外事故，僅僅 2020 年間便因空軍失事折損四架軍機（其中三件發生在下半年），造成包含參謀總長在內的多位官兵殉職（德國之聲，2021）。這些軍事訊息頻繁見於報章媒體，或許反映出一種「我消彼長」的態勢，造成民眾的軍事信心下滑。由於資料限制，這種信心下滑的現象，反映的是暫時的波動還是一種長期的趨勢，有待未來進一步的追蹤與考察。

從二元對數迴歸分析來看（參見表 8），性別、世代、教育程度、族群身分、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統獨偏好，對於軍事信心都可能有所影響。在兩個模型當中，我們明顯看到性別有相當一致的影響，女性（相對於男性）對軍隊保衛台灣的能力缺乏信心。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較高者（大專及以上），對軍事實力有信心可能性較低。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支持者）、雙重認同者與中國人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對軍事實力有信心可能性較低（唯中國人認同僅在上半年的資料分析中顯著）。台獨偏好者對軍事實力較有信心，而統一偏好者在 2020 年上半年的調查中，則顯得較沒有信心。

表 8：軍事信心的二元對數迴歸模型分析

自變項	2020 上半年	2020 下半年
女性(男性)	-0.396**	-0.563***
世代(年老世代：50 歲及以上)		
年輕世代：29 歲及以下	-0.274	0.179
中年世代：30-49 歲	-0.524**	-0.177
未婚(已婚)	-0.028	0.009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05	0.010
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0.734**	1.018***
高中職	0.364*	0.308 ⁺
族群身分(外省人)		
客家人	0.543 ⁺	0.338
閩南人	0.512*	0.233
政黨傾向(泛綠)		
中間選民	-0.734***	-1.095***
泛藍	-1.412***	-1.511***
國族認同(台灣人)		
兩者都是	-0.713***	-0.913***
中國人	-1.758***	-0.133
台獨偏好	0.321*	0.414**
統一偏好	-0.342*	-0.081
Nagelkerke R ²	0.261	0.285
N	1082	1089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號內為參照組。

變項顯著程度 Omnibus 檢定 p 皆 < 0.05。

模型適合度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p 皆 > 0.05。

表 9：保衛決心

	2017	2018	2020
願意	69.1% (847)	72.0% (884)	76.4% (930)
不願意	26.6% (326)	23.9% (294)	21.7% (264)
沒意見/不知道/其他	4.2% (52)	4.1% (50)	2.0% (24)
N	1225	1228	1218

注：括號內為分配次數。

保衛決心

有關保衛家鄉的決心，中國效應調查曾在 2017 與 2018 年做過訪問，而社會意向調查則是在 2020 年做了訪問（參見表 9）。從這幾年的調查結果來看，保衛台灣的決心有上升的趨勢，從 2017 年的 69.1%，上升到 2020 年的 76.4%。

在二元對數迴歸方面（參見表 10），2017 年的模型顯示性別、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統獨偏好對於保衛決心有所影響。女性、中間選民與泛藍支持者（相對於泛綠支持者）、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以及統一偏好者，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的可能性較低；相對地，台獨偏好者則較有可能表達保衛台灣的決心。在 2018 年的模型中，世代、婚姻狀態、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對保衛台灣的決心有顯著影響。相對於 50 歲以上的年老世代，年輕世代與中年世代比較不可能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未婚的民眾比起已婚的民眾更可能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這些傾向可以從個人切身利益關係來理解：年輕與中年世代因為自己可能被徵召上戰場（年輕世代為常備軍，中年世代為後備軍）、已婚者可能因為有家庭必須照顧，或是家人有可

表 10：保衛決心的二元對數迴歸模型分析

自變項	2017	2018	2020
女性(男性)	-0.397**	-0.211	0.148
世代(年老世代：50 歲及以上)			
年輕世代：29 歲及以下	-0.204	-1.205***	-0.409
中年世代：30–49 歲	0.172	-0.488**	-0.242
未婚(已婚)	0.003	0.460*	-0.142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01	0.019 ⁺	0.015
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0.167	-0.224	-0.147
高中職	0.242	0.337 ⁺	0.239
族群身分(外省人)			
客家人	0.028	0.271	0.564 ⁺
閩南人	0.229	0.243	0.586*
政黨傾向(泛綠)			
中間選民	-0.879***	-0.466*	-0.937***
泛藍	-0.794**	-0.593*	-1.760***
國族認同(台灣人)			
兩者都是	-0.411*	-0.915***	-0.601**
中國人	-0.538 ⁺	-1.097***	-0.090
台獨偏好	0.411**	0.297 ⁺	0.405*
統一偏好	-0.327*	-0.248	-0.166
Nagelkerke R ²	0.114	0.143	0.191
N	1065	1090	1088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號內為參照組。

變項顯著程度 Omnibus 檢定 p 皆 < 0.05。

模型適合度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p 皆 > 0.05。

表 11：國防準備

	恢復義務役徵兵制			男女皆兵	
	2017	2018	2019	2018	2020
贊成	86.3% (1057)	86.7% (1065)	78.5% (983)	48.8% (599)	59.7% (727)
不贊成	12.2% (150)	11.1% (136)	17.5% (219)	49.4% (607)	39.0% (475)
沒意見/不知道/其他	1.5% (18)	2.2% (27)	4.1% (51)	1.8% (22)	1.3% (16)
N	1225	1228	1253	1228	1218

注：括號內為分配次數。

能被徵召，因此展現保衛決心的可能性較低。相對於泛綠支持者，中間選民與泛藍支持者更有可能不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者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的可能性更低。在 2020 年的調查中，世代與婚姻狀態的影響不再，但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台獨偏好仍具有顯著影響，影響的方向與前兩年一致。此外，閩南人相對於外省人，更有可能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

國防準備

在國防準備方面（參見表 11），當受訪者被問到「是否贊成台灣保留至少一年的義務役徵兵制度」時，2017 與 2018 年都有高達 86% 以上的民眾贊成，在 2019 年則稍微下降到 78.5%，但整體來說，贊成的比例依舊遠高於不贊成的比例。但如果被問到「是否贊成男女都同樣服一年的義務役」，比例則明顯下滑，在 2018 年的中國效應調查結果，贊成的有 48.8%，2020 年的社會意向調查結果，則為 59.7%。

從二元對數迴歸模型的分析結果來看，在「恢復徵兵制」

表 12：國防準備（恢復義務役）的二元對數迴歸模型分析

自變項	2017	2018	2019
女性(男性)	-0.024	-0.286	0.197
世代(年老世代：50歲及以上)			
年輕世代：29歲及以下	0.298	-0.297	-0.883**
中年世代：30-49歲	0.150	-0.269	-0.254
未婚(已婚)	0.081	-0.059	0.351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04	-0.004	-0.003
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0.712*	0.040	-0.247
高中職	0.073	0.481 ⁺	0.523*
族群身分(外省人)			
客家人	-0.259	-0.033	-0.251
閩南人	-0.204	-0.040	-0.332
政黨傾向(泛綠)			
中間選民	-0.612*	-0.277	-0.205
泛藍	-0.613*	-0.488	-0.112
國族認同(台灣人)			
兩者都是	-0.380 ⁺	-0.180	-0.015
中國人	-0.250	-0.327	-0.335
台獨偏好	-0.259	-0.224	0.195
統一偏好	0.271	0.150	0.337 ⁺
Nagelkerke R ²	0.040	0.030	0.045
N	1093	1103	1062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號內為參照組。

變項顯著程度 Omnibus 檢定 p 皆 < 0.05。

模型適合度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p 皆 > 0.05。

方面（參見表 12），2017 年的模型顯示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有顯著影響，國中及以下（相對於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較可能支持恢復徵兵制，而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支持者）較不可能支持恢復徵兵制。2019 年的分析結果則顯示年輕世代（相對於年老世代）較不可能支持恢復徵兵制，而高中職（相對於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較可能支持恢復徵兵制。在「男女皆兵」的問題上（參見表 13），性別、世代、婚姻狀態與政黨傾向，都是顯著的影響因素。在 2018 與 2020 這兩年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女性（相對於男性）、已婚者（相對於未婚者）、29 歲及以下的年輕世代（相對於 50 歲以上的年老世代）、泛藍支持者（相對於泛綠支持者），都更不可能贊成男女皆兵。雖然這樣的發現並不令人意外，但我們也可以從這個結果來推論，當人們發現自己（或家人）必須付出實際代價（當兵至少一年）的時候，對於國防準備的支持會顯著降低，因為這牽涉到個人的切身利益。

結語與未來研究展望

上述的分析結果，可以綜合整理在表 14。整體來看，我們可以大致拼湊出一個台灣民眾戰爭認識的粗略樣貌。

從表 14 來看，台灣民眾的戰爭認識各個面向之間雖然有一致之處，但也存在着內在矛盾。歷年資料的分析顯示，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的敵情意識升高、長期的戰爭預期升高，保衛決心升高，這些都是可以合理解釋的。然而，國防準備（恢復義務役）的支持下降，軍事信心不足，戰爭預期不高，尤其無論是長期或短期的戰爭預期，台灣民眾認為「不會發生戰爭」的比例都佔多數，可以說「風險意識」不足。當然，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由於民眾對自己的軍事實力信心不足，所以基於主觀願望的投射，希望戰爭最好不要發生，因此戰爭預期偏低。

如果把焦點放在自變項來看（參見表 15），我們可以發現，

表 13：國防準備（男女皆兵）的二元對數迴歸模型分析

自變項	2018	2020
女性(男性)	-0.357**	-0.468**
世代(年老世代：50歲及以上)		
年輕世代：29歲及以下	-0.831**	-0.924**
中年世代：30-49歲	-0.580***	-0.266
未婚(已婚)	0.713***	0.503*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05	0.039
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0.037	-0.126
高中職	0.008	-0.102
族群身分(外省人)		
客家人	0.145	-0.297
閩南人	-0.119	-0.267
政黨傾向(泛綠)		
中間選民	-0.219	-0.787***
泛藍	-0.469*	-0.963***
國族認同(台灣人)		
兩者都是	-0.008	0.012
中國人	0.164	-0.605
台獨偏好	0.130	0.185
統一偏好	0.063	-0.009
Nagelkerke R ²	0.064	0.088
N	1106	1090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號內為參照組。

變項顯著程度 Omnibus 檢定 p 皆 < 0.05。

模型適合度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p 皆 > 0.05。

表 14：台灣民眾的戰爭認識摘要

面向	資料來源與調查年份	影響變項	變化趨勢與重點摘要
敵友區辨	中國效應 2017-2020 (視中國大陸政府為敵人)	性別、世代、 婚姻狀態、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國族認同、 統獨偏好	認為中共是敵人的趨勢逐年上升。性別在各年度的影響均十分顯著，女性較不可能把中共當成敵人。世代因素在 2018 與 2020 年有顯著負面影響（年輕世代較不可能把中國大陸政府當成敵人）。
	中國效應 2017-2020 (視中國大陸政府為朋友)	世代、收入、 教育程度、族群身分、 政黨傾向、國族認同、 統獨偏好	認為中共是朋友的趨勢逐年下降（2018 年除外）。相較於「敵人關係」，性別在「朋友關係」上面並無顯著影響。世代因素僅在 2018 年有顯著正面影響（年輕世代較可能把中國大陸政府當成朋友），而該年度將中共視為朋友的百分比（38.8%）也是歷年調查中最高。
戰爭預期	長期： 中國效應 2017-2020	性別、教育程度、 統獨偏好	長期的戰爭預期升高，但整體來說認為不會發生戰爭的比例仍高於會發生戰爭的比例。
	短期： 社會意向 2020	世代、教育程度	僅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民眾認為兩年內可能發生戰爭。
軍事信心	中國效應 2020 (上半年)	性別、世代、 教育程度、族群身分、 政黨傾向、國族認同、 統獨偏好	有信心（51.5%）稍多於沒信心（46.9%）。女性、中年世代、泛藍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以及統一偏好者，較可能對軍隊保衛台灣的能力沒有信心。
	社會意向 2020 (下半年)	性別、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國族認同、 統獨偏好	沒信心（53.5%）多於有信心（44.6%）。女性、泛藍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雙重認同（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較可能對軍隊保衛台灣的能力沒有信心。

表 14：台灣民眾的戰爭認識摘要（續）

面向	資料來源與調查年份	影響變項	變化趨勢與重點摘要
保衛決心	中國效應 2017、2018 社會意向 2020	性別、世代、 婚姻狀態、族群身分、 政黨傾向、國族認同、 統獨偏好	各年度呈現上升趨勢。
國防準備	中國效應 2017-2019 (恢復義務役)	世代、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2017 與 2018 年，對義務役的支持度皆在八成六以上； 2019 年跌破八成，但仍有 78.5% 的支持度。
	中國效應 2018 社會意向 2020 (男女都要服一年兵役)	性別、世代、 婚姻狀態、政黨傾向	2020 年 (59.7%) 較 2018 年 (48.8%) 上升了大約 10 個 百分點。由於關係到切身利害，女性、年輕世代與已婚 者，較不可能支持全民皆兵（男女都服兵役）。

表 15：各個自變項對戰爭認識的影響一覽

自變項	戰爭認識(依變項)				
	敵友區辨	戰爭預期	軍事信心	保衛決心	國防準備
性別	V	V	V	V	V
世代	V	V	V	V	V
婚姻狀態	V			V	V
收入	V				
教育程度	V	V	V		V
族群身分	V		V	V	
政黨傾向	V		V	V	V
國族認同	V		V	V	
台獨偏好	V	V	V	V	
統一偏好	V	V	V	V	

性別與世代是影響民眾戰爭認識的兩大主要因素，在五個面向上都產生顯著影響。其次則是教育程度、政黨傾向與統獨偏好，分別都在四個面向上產生顯著影響。相較之下，族群身分與國族認同，對戰爭認識雖然也有影響，但影響並不全面。性別對戰爭認識的顯著影響並不令人意外，但過去有關性別與戰爭或軍事主義（militarism）的研究已經指出，從生物傾向預設「男人喜歡戰爭、女人愛好和平」的二元觀點並不成立，必須更深入地就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來分析男性與女性在面對戰爭或軍事行動時採取不同的態度或扮演不同的角色（Moran, 2010）。同樣地，世代的影響也必須從個別的脈絡中來解讀。年輕世代在保衛決心與國防準備上可能有負面效果（較不願意表達保衛決心，或是較不支持義務役），而他們在敵友區辨的判別上，也不見得符合一般「天然獨世代比較反中」的常識性推斷。

本研究最耐人尋味的發現，應該是台灣民眾對戰爭的預期與警覺，與媒體及學者專家的看法，存在相當程度的落差。儘管外媒將台灣形容為「地表最危險的地方」，但身處險境的台灣民眾，似乎老神在在，不太擔心台海可能發生戰爭。如何解釋這個落差？除了上述「主觀意願投射」（因為實力不足，所以希望最好不要發生戰爭）外，筆者認為一部分的原因，可以從台灣的地緣政治處境與歷史經驗來加以理解。筆者過去曾經指出，台灣的國族問題，本身即是東亞近現代以來一連串戰爭所留下來的戰爭遺緒，其中犖犖大者包括甲午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與韓戰；換言之，台灣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其歷史形成過程與上述這幾場戰爭及其結果緊密相關（汪宏倫，2014）。然而，這幾場戰爭當中，沒有一場是以台灣為主體而進行的戰爭，台灣只能被動接受戰爭的結果。即使1949年之後，台海曾經發生過零星的戰役（例如八二三砲戰），但當時畢竟仍舊是在冷戰結構與「保衛中華民國」的框架之下所進行的戰役，而不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戰爭。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綠營人士與民進黨支持者把國共內戰（包含八二三砲戰）視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戰爭」，與台灣人民無關（參見陳弘美，2018）。的確，台灣人民到目前為止，還從來不曾以「台灣」自身為主體打過一場對外戰爭。換言之，歷史上台灣曾經被捲入過的戰爭，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地緣政治強權角力的結果，即使目前台灣被形容為「最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這場戰爭也只是一場代理人戰爭，是美中強權在地區爭霸可能產生的衝突過程，而不是台灣為了自身主體性而進行的戰爭。由於自己並非戰爭的主體，加上台灣長期以來孤立於國際、對國際事務缺乏關心，有可能導致台灣民眾對於「可能發生戰爭」這件事情，並沒有投入太多關注與思考，也沒有產生太高的預期或警覺。

有關台灣社會與民眾的戰爭認識，過去鮮少系統性的探究，本文嘗試就理論概念上分析戰爭認識的不同面向，並從過去有限的調查資料中，嘗試拼湊出台灣民眾近年來戰爭認識的基本

輪廓與初步圖像。由於資料所限，本文所描繪的戰爭認識圖像並不算完整，只能說是初探性質；上面的資料分析，也讓我們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與待解的謎題，值得進一步探究。相關議題以及更為系統性的資料蒐集與分析，還有待未來的研究持續探討。

參考書目

- 汪宏倫。2014。「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載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頁 157-225。
- 陳弘美。2018。「徐佳青一句『八二三是民進黨打仗嗎』？打臉小英的團結」，中時新聞網，8月24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24002531-260407?chdtv>)。
- 德國之聲。2021。「台灣：共軍軍機 2020 年擾台逾 380 次」，聯合新聞網，1月1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5138348>)。
-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Chickering, Roger. 1999. "Total War: The Use and Abuse of a Concept," in Manfred F. Boemeke et al. (eds.), *Anticipating Total War: The Germ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28.
- Cole, David L. 1973. "Perceptions of War and Participants in Warfare: A Ten-Year Replic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0(1/2):115-18.
- The Economist*. 2021.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America and China Must Work Harder to Avoid War Over the Future of Taiwan," 1 May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5/01/the-most-dangerous-place-on-earth>).
- Farley, Robert. 2017. "5 Places World War III Could Start in 2018," *The National Interest*, 15 December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5-places-world-war-iii-could-start-2018-23686>).

- Kim, Dukhong. 2014. "Affect and Public Support for Military Action," *Sage Open*, 4(4):1–13.
- Kim, Woosang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1995. "How Perceptions Influence the Risk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9(1):51–65.
- Knowlton, James and Truett Cates (trans.). 1993. *Forever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Original Documents of the Historikerstreit, 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Singularity of the Holocaust*.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 Ludendorff, Erich. 1935. *Der Totale Krieg*. München: Ludendorffs Verlag.
- Moran, Mary H. 2010. "Gender, Militarism, and Peace-Building: Projects of the Postconflict Mo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9:261–74.
- Mueller, John E. 1979. "Public Expectations of War Dur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2):301–29.
- Myers, Teresa A. and Andrew F. Hayes. 2010. "Reframing the Casualties Hypothesis: (Mis)Perceptions of Troop Loss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2(2):256–75.
- Oren, Eitan and Matthew Brummer. 2020. "Reexamining Threat Perception in Early Cold War Japa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2(4):71–112.
- Smith, Philip. 2005. *Why War? The Cultural Logic of Iraq, the Gulf War, and Sue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